

CHAPTER

14

为什么能
唤起民众、
凝聚人心



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个人的秘密小党起步，经过20多年努力取得执政地位，这一结果出乎当时很多国际政要的意料。尽管国外一些评论家对中共取得政权的评析各有千秋，但大多承认它与中共能够唤起民众、团结奋斗有密切关系。2010年，在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测验表明，87%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现状表示满意，在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一。2011年1月26日，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发布的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可能有人对上述两个数据持不同态度，但它多多少少能告诉世界中共确实做对了什么。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其坚强有力的宣传思想工作功不可没。这话是不无道理的。

理论创新使党立于时代潮头

远在西方文化思潮进入中国之前，古代中国早已有了一个关于正统思想脉络的意识，这就是孔孟之道，也称儒家。儒家知识传授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儒家经典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千百年来，孔孟“道统”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核心部分。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孔孟传统思想不堪一击，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渐渐淡去，晚清重臣李鸿章惊呼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大多数仁人志士认为中国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开始寻求挽救清王朝的良方，但从“师夷之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没有起到根本作用。1894年甲午海战中，中国惨败给历史上曾是“学生”身份的日本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觅救国的制度和思想武器——日本的明治维新因学习西方才使国家迅速发展强大起来。但变封建皇权为君主立宪的制度改革试验，因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反对仅维持了百余天即告失败。而思想的闸门一旦开放就无法阻抑，西方的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先后在中国出现甚至大为流行，但先后又都成为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

这一时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就思想内容而论，可以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短短几十年，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墨子、老子和韩非子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从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和列宁，从古老经学的考证、论辩到现代科学的实验、推理，中国人似乎都多少有所涉及。一部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20世纪初期的思想发展简图，几乎走过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智慧史。夸张一点说，它简直就是一部缩编了的人类思想的百科全书，相比较中国思想史上先秦、魏晋和明清三个里程碑式的“百家争鸣”局面来说，从“戊戌”到“五四”的中国思想发展，显得更为动荡，更为艰苦，也更为矛盾。¹⁴⁵

在历经苦难不断上下求索之时，当时和中国国情差不多的邻居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如黑暗之中见到曙光，即以欣喜的心情迎请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对于这段探索的历史，1949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时就这样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了，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¹⁴⁶

问题是，对于非常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讲，为什么要接受属于外来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等其他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及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事业？

其中可探究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广泛社会心理基础。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两者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和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和看法上，有着根本的契合点。

大同世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是儒家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这与马

14. 为什么能唤起民众、凝聚人心？

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契合的。在中国人民看来，如同过去的儒家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现在和未来社会的有“道”文化，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指明了中国人传统理想社会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另外，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中有着可贵的“民本”思想，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这一思想逐渐演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才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中南海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新华门为中南海南门，大门内影壁上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

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也真切体会到了自己改变历史的力量和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

总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点，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经历百年没落后找到了复兴的鲜活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中国化，创造了符合民族传统的认知载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并以此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奋勇向前，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目标。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形式，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的重要信念。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已经深深印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他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思想僵化和诸多的思想禁区，率先号召大家打破思想僵化，大胆解放思想。邓小平有力支持了当时中国正在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被鼓励为自己思考。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不管是马克思、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本人，都不再被盲目地和无条件地接受”。¹⁴⁷有的国外观察家在总结当代中国发展经验时，也认为“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支柱”¹⁴⁸。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看法后，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一思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中国发展进步的思想指南。邓小平的一些观点，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争论”等，成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和行动指南。

江泽民深知中共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慎重思考的基础之上，2000年，他在考察中国富裕省份广东时提出了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理论，被称之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层次的新问题，胡锦涛号召全党“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思想。

国内外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中共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最新成果，来“武装”全党全国，以新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的步调。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中共的宣传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每一个重大的发展节点上，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让它的党员不断抛弃落后于时代的陈旧观念，迅速适应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其结果是达到人民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自由宽松、政府的公开透明。

行动口号唤起 亿万民众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提出响亮的行动口号，以唤起民众投入革命和建设事业。1921年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清醒地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必须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现阶段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统一起来。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把最高纲领（理想）和最低纲领（现阶段奋斗目标）统一起来的清晰判断所形成的口号——“反帝反封建”，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得农村者得天下”。¹⁴⁹ 1925年，毛泽东完成了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呼吁共产主义者放弃城市转至农村，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步。为动员农民参加获得土地的革命，中共在农村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并切实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征收来，分给农民。农民觉得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共产党还通过诉苦会控诉地主、编排革命戏剧以及秧歌宣传革命、贴宣传标语反抗统治者等多种形式，把革命主张迅速传播到农民居住的地方，获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凭借其武力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当中国国民党政府还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际，



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的文艺团体到农村演出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

历史的
轨迹

中国
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中共率先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获得了包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有识之士在内的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同时在其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政治上提出建立容纳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士的“三三制”政权的目标，经济上提出“减租减息”政策，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团结最大多数的国人一致对日。这样，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边。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此指出，共产党“举起民族主义和革命这两面大旗，把农民动员到他们自己的一边”¹⁵⁰。与国民党对待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一点都不高明”¹⁵¹相比，这个时期包括宣传思想工作在内的共产党的工作“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¹⁵²。

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中共又提出了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被国民党所拒绝，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为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

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充分满足农民的要求，以打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各解放区立即提出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口号，动员广大群众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摧毁代表国民党利益的基层地主恶霸及其控制的乡村政权，并用参军支前等实际行动维护来之不易的宝贵土地。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摧枯拉朽，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地动山摇。在转折年代的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以鲜明有力的口号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来凝聚人心更是作为成功的经验与时俱进。比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凝聚起了民心；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等等。当然，也要承认，由于一段时期内指导思想“左”倾发展影响，有些口号比如“多快好省”、“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恰好反证了行动口号和奋斗目标的提出不能脱离实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以共同的奋斗目标凝聚人心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可靠、扎实有力、深入人心。

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向他描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前景。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

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¹⁵³

自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都对小康前景作出具体设计。在小康社会灿烂前景的召唤下，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一心一意奔小康。1997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三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到20世纪结束时进入小康社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不失时机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正式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凸现出来。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着眼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如同“小康”一样，这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和向往的和谐社会概念引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并赋予其崭新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第一次成为有13亿多人口参与的生动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尤其是各个历史阶段提出的行动口号，恰当地把远大理想与当前任务结合起来，围绕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来展开，合情合理，入心入耳，好记易懂，理所当然地打动了亿万民众的人心，凝聚起全党全国的力量。

时代精神和榜样产生无穷的**影响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和反映各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精神表现。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共产党人强调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语）的愚公移山精神；在建设时期，面对千头万绪的繁重任务，共产党人发扬的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语）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改革时期，面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障碍，共产党人展现的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语）的改革创新精神。

这种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精神，与中华民族历来所尊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总结归纳的各个时代的精神，广为传播，为民众所认同，将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不足为怪的。同时，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主体精神下面，还包括若干其他方面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也对此进行了提炼并赋予其新内涵，来凝聚民心，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红军不畏艰难险阻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从中凝炼出长征精神，来鼓舞全国的党员和群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戒骄戒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在他看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做是一个新的“长征”；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人仍然把进一步稳妥地推进改革看做是“新长征”：纵有千难万险，仍要勇往直前，最终必将取得胜利。正如莫里

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不管长征当时人们多么艰苦，长征经验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更大的使命感。人们一定先有希望才能采取行动；他们一定不仅有各种理想和使命感，而且一定有他们希望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使命的希望和信心。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给人们提供这种希望和信心的基本感觉，使人们确信下定决心的人们甚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是能获得胜利的，正是长征，以及长征产生的许多民间传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事件。”¹⁵⁴

再比如，在建设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勇气，被提炼升华为“两弹一星”精神，来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已故中国著名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少年时代在北平读中学时曾为校友。邓稼先逝世7周年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杨振宁写的纪念文章《邓稼先》，此文后被收录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七年级语文（下册）的必读课文中。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1971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邓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邓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美国人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于是，杨振宁就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当杨振宁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请他吃饭时，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他，是邓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读至此，杨振宁写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百感交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时至今日，

“两弹一星”精神，仍是振奋中国民心、凝聚民族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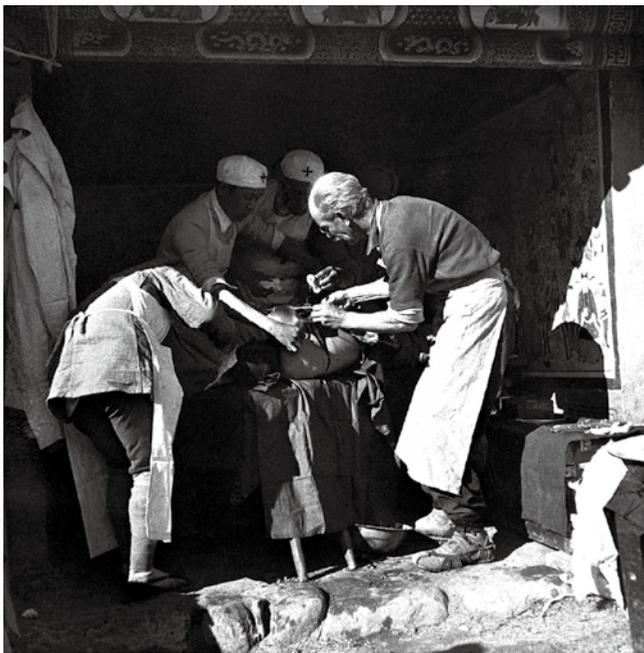
还比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人民面对不期而至的灾难而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争精神，被总结概括为抗震救灾精神，来激励全国人民形成百折不挠、团结一心、患难与共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但无论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是1998年的全国性的洪水灾害；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还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青海玉树大地震，都没有让中国人民怨天尤人、低头退缩，反而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展现出了万众一心、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这一精神，肯定和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恢复重建家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多难兴邦，多难砺党。中国人向来看重面对艰难困苦应体现出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消极屈服？还是涅槃重生？中国人民总是选择后者。正如多次造访中国的中法跨文化基金会——谢阁兰基金会执行主席梅乐对中国记者所说，她非常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坚忍和团结，战争、饥荒、洪涝灾害……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中国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中国就是中国”。

在转瞬即逝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总想抓住某些不朽永恒的东西。美国现代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人之不朽》一文中指出：“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当然，他所说的“不朽”，是指宗教性的不朽。中国人也有追求“不朽”的传统，中国共产党通过褒奖各类身居不同工作岗位的优秀人物的举动告诉民众，普通民众也可以在平凡工作中达到不朽，而成为人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了这样的榜样，这样的榜样被树立起来，为思想工作增添了活生生的素材，拉近了榜样与群众的距离。中国人有“见贤思齐”的品性，广大群众以榜样为学习标杆，满怀理想和信念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比如，在中国革命时期，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友人、著名胸外科医师

14. 为什么能唤起民众、凝聚人心？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因给伤员做手术时不幸受感染，牺牲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毛泽东闻讯，深感悲痛也深为感动，亲自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庄重地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图为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

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优秀的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及其精神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的宣传和弘扬，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本职工作，创造不平凡业绩的强大精神动力。

再比如，在建设时期，一个因公牺牲的年轻解放军战士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学习的楷模，他就是雷锋（1940~1962）。在他22年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就连坐火车出差时也时刻给人以帮助。人们形象地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因公逝世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自此每年3月5日便成了中国全民学雷锋的日子。时至今日，在中国只要有人干了好事，人们就会把他们比喻为“活雷锋”。

还比如，在改革年代，一名叫张海迪的残疾女青年成为全国人学习的榜样。她身残志坚，靠自学学会了医学知识，靠坚强的意志，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她的事迹广为流传——一个残疾人能做到的事情，健全人岂敢落后？其结果是人人争做时代弄潮儿。张海迪的榜样和事迹，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勇向前的中国人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屡创生命奇迹的她，现在担任中国残联主席一职。

以上这些英模人物，仅是中国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诸多榜样中的突出代表。

榜样蕴藏无穷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当今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道德观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人民群众深情呼唤着、期待着良好的道德风尚。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树立榜样典型，褒扬道德模范，弘扬社会正气，树立道德新风，以社会主义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为此，2007年以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



援藏干部孔繁森(右)在阿里日土县过巴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不幸以身殉职。为表彰其无私奉献的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其“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联合开展了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使道德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以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评选出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以此凝聚民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美国知名人士库恩认为:“精神价值将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¹⁵⁵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优秀文化与艺术作品 “照亮人心”

文化与文学作品无疑具有感染人心的作用，但仅有此还不够，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就认为：“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¹⁵⁶ 法国斯塔尔夫夫人同样认为：“光是震撼人心是不够的，必须照亮人心。”¹⁵⁷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唤起民众、凝聚力量，与其弘扬的优秀文化和艺术作品所起的“照亮人心”的作用密不可分。

中共诞生前夕，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任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赛先生”（科学，Science）、“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新文学。针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六卷五号，办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新青年》在中国首先高举起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在当时起了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时至今日，科学与民主仍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主题。

即使在白色恐怖极为严峻的时期，革命根据地被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放弃用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力量来鼓舞人心、团结民众、与国民党作斗争。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左联”的旗帜人物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

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左联”在国民党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六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面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毛泽东要求艺术家和作家的个人创造力服从于中华民族奋斗目标，作家要为人民创作，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广大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延安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对此，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指出：“对老百姓怀有一种新的尊重和强调使他们得到‘解放’的目的是要唤醒和动员中国广大农民。文化运动着重于以木刻为形式的版画艺术，这种艺术作品能够很便宜地进行复制。合唱与一种古老的乡村舞蹈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秧歌。这是一种唱着民歌调子，脚踩一套步点，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穷人歌剧艺术，它给人以获得解放的欢乐感。老百姓的新信念包含了这样的革命理想——现代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能够用来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变并富裕起来。这种对老百姓的崇拜使干部和军队充满活力。党的工作者必须住在村庄里与农民一起干活，吃农民所吃，住农民所住，想农民所想。只有这样，党的工作者才能领导群众闹翻身。”¹⁵⁸

在革命过程中，党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拿起笔杆子，深入群众，用自己的作品来影响和带动群众。比如，农村生活基础不厚的丁玲响应号召深入农村，写出了反映华北农村土改斗争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出版后，发挥了极大的宣传推动作用，农民们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土改运动。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种状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等文学艺术作品中，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回忆战争岁月、苦难年代、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文学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这些文学作品为凝聚人心，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

比如，如同国外学者指出的那样：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龙须沟》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最早获得成功的剧作之一。“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的雅称，由于旧的腐败政府的忽视而造成此沟恶臭冲天。于是，它成为了生活在沟边的穷人命运的象征。然而这种惨景并没有使市政当局对这些栖身之地免征“卫生税”。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排掉了沟里的臭水，修建了排水道，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昔日的“臭水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类似这样的新旧社会的对比还贯穿于老舍的后一个剧本《全家福》中：民警为了使一个在旧社会因各种原因失散的家庭重新团圆而不遗余力。¹⁵⁹

再比如，由罗广斌、杨益言于196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红岩村”是重庆的一处地名）是一部纪实性的作品。小说以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为主线，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全国解放，挫败敌人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最后决战，成功地塑造了以许云峰、江姐、成岗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



图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一个镜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江姐（中，于蓝饰）和同志们利用红被面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迎接胜利。

作品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气氛，语言朴实，笔调悲壮，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国外专家的看法是：《红岩》是对那些在20多年的地下斗争中献身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感人至深的纪念。它也许比其他共产主义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由于被改编为电影和舞台剧，它具有最广泛的知名度。它所记叙的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使它完全可以跻身于中国散文史诗的传统行列。¹⁶⁰这的确是智者之言。时至今日，《红岩》的影响仍是巨大的。《红岩》描写的共产党人的战斗状态成为不可磨灭的“红岩精神”，“红岩”所在的重庆的“唱红歌”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当然，在建国后一段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作品深受“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个人崇拜、阶级斗争色彩浓厚。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步伐的迈开，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了反思。对于这一现象，国外学者的见解也是很独到的。他们指出：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尖锐地涉及“文化大革命”恶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引起了全国的瞩目，它触及了被“文化大革命”牺牲了的年轻人的犯罪及犯罪渗入他们正常生活的后果。卢新华是另一位很快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在小说《伤痕》（1978）中，他分析评价了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后剧烈变化的政治氛围中，一个所谓进步的女儿和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获了奖，并被收入一短篇小说集再次发行。这部短篇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卢新华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典型，这是描写正直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文学。这种暴露文学确实具有真诚的激情，但看来它们也服务于一个政治目的：加强了旨在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党内外的健康力量。¹⁶¹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呈现井喷状态。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学艺术逐渐打破以往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创作题材上也由过去反映革命战争和历史的宏大题材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创作模式也由传统单一和一元化转向多元化格局，出

现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创作样式、思潮、流派。针对这一变化，在继承毛泽东时代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基础上，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后来被简称为“二为”方向的新口号。这个口号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符合文艺规律。邓小平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¹⁶²

各级宣传部门、文化工作部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引导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规律，引领舆论导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组织下，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活动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每年拿出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或电影）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首好歌，来弘扬主旋律。1996年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单位，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人民，用最好的东西去“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中共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库恩认为，美国总统向国会所作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中，很少以任何形式提到文化，更不会将之作为重要议题。然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所作的正式工作报告中，却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文化问题。¹⁶³这是库恩的一大“发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将有更多新举措陆续出台。

畅通思想沟通渠道 未雨绸缪

中共一贯提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使用他们的话语，反映他们的意愿，集中他们的智慧，表达他们的意志，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为畅通思想沟通渠道，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1924~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成员兼秘书的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还亲自撰写了数量巨大的文章、新闻稿以鼓动人民群众。

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实行监督。1950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1953年毛泽东在党内批示中强调，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当在报纸上广为揭露”，还要求报刊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呼声。这项要求在《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作为一项常规工作一直延续下来。毛泽东亲自处理群众来信还推动了中央各部委、中央局、各省市负责同志抓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使地方领导干部处理来信来访蔚然成风。各级党政机关为了加强和人民通讯都建立了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党对人民来信重视的声誉。

邓小平也做过宣传工作，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主编，全面负责报纸的编务。他深知思想渠道通畅的重要性，建国后他成为中共中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央总书记之后提出的“猫论”，就是来源于群众的语言和群众实践，所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在启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更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十分看重思想沟通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¹⁶⁴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始终保持与群众思想沟通交流的渠道，依靠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共同努力，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为兑现“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云南退休干部杨善洲22年造林5.6万亩，价值3亿元，全部无偿上缴国家。图为杨善洲（右）生前在向村民传授林木嫁接技术。

江泽民对于畅通与群众交流渠道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必须深入到村到户，特别要到贫困村，“直接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盼什么、要求什么、反对什么，在农民中交一些知心朋友，”¹⁶⁵“要认真调查研究社会各种动态以及群众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变化，有针

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要努力建立一支能够与群众心心相印、整天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又善于做工作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¹⁶⁶

随着网络应用不断普及和扩大，网络也成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听取民声、汇聚民智、科学决策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与网友亲密接触，共议国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与网友在线聊天时说：“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新动向，2010年9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中国推出直通国家领导人的网络热线”的文章中指出：“这一创新是执政党将宣传工作与互联网时代的公关技巧相结合的最新尝试。”这一判断真是一语中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共意识到，宣传思想工作正面临着巨大挑战，要达到思想舆论统一的目标，比起过去要难上十倍、百倍，创新思想宣传工作刻不容缓。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承认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滞后于现实，确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迫切性。

自2011年4月下旬开始，一组署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4月21日打头第一篇的题目就十分醒目——《“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其内容更令执政者警醒：“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4月28日发表的第二篇《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进一步提出：“大

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对于多元化的思想，文章指出：“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的评论；5月26日，又发表《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的评论，评论最后指出：“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鉴于过去的经验，人们有理由相信，能够紧随时代、直面挑战的中国共产党，必定能够继续保持其宣传思想工作的传统优势，不断提出治党治国的新理念、新措施，继续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全党全国走向未来。

